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 戴伟, 李良品, 丁世忠
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5366-9490-3

I. 乌… II. ①戴…②李…③丁… III. 乌江—流
域—文化遗产—文集 IV. K2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8869 号

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WUJIANG LIUYU FEIWUZHI WENHUA YICHAN YANJIU

戴伟 李良品 丁世忠 主编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曾令琳

责任校对: 李小君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 mm 1/32 印张: 16.5 字数: 415 千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7-5366-9490-3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前 言

■总 论

论重庆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彭寿清	003
乌江流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原则	马传松 李 伟	013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保护与传承	李良品 彭福荣	022
乌江流域古代移民与文化多样性述论	彭福荣	035
略论乌江特色文化展览馆的建设	吴冬梅	050

■文化空间研究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命伦理思想论析	张世友 冉建红	059
涪州文化的渊源、特点与历史地位	李 胜	072
石柱“秦良玉文化”的类型、成因与保护	李良品 冉建红 吴冬梅	083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传统习惯法的扬弃	胡建华	098
乌江流域土家族习惯法概念、内容、特征探析	胡建华	106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习惯法与国家法的相互作用	胡建华	120
土家族村落的休闲文化变迁——以鄂西南石桥坪村为例	王希辉 谭 垚	129
土家族村落家族文化的伦理精神述论	李 伟	136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	李 伟	150

■传统表演艺术研究

巴人乐器文化及其意蕴	曾 超	161
巴渝舞与摆手舞之比较	李良品	175
论巴渝舞的起源与嬗变	李良品	185
巴渝舞音乐美学特征论略	易小燕	194
土家族哭嫁歌初探	方玲玲	201
论乌江流域民间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	熊 雄	208
浅析土家族“哭嫁”的形式和内容	陈海鹰	215
土家族摆手舞审美特征略探	许文涛	220
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生态与文化遗产	李 伟	224

■民俗活动、礼仪、节庆研究

民间“红蛋”的文化意蕴解读	丁世忠	235
舞蹈中的祭礼——论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内涵	丁世忠	243
土家族的祈子习俗	丁世忠	249
论重庆土家族地区的服饰与饮食民俗	丁世忠	253
乌江流域苗族服饰艺术及文化蕴涵	余继平	271
土家族传统服饰变迁及其当代启示	王希辉	282
乌江源头彝族婚俗程序初探	朱飞镛	292
渝东南土家族婚姻程序与礼俗调查	蹇 利	299
论土家族丧葬的狂欢精神——以娱神仪式为例	李 伟	305

■传统手工艺技能研究

张氏庭院建筑雕刻艺术及文化蕴涵解读	余继平	319
-------------------	-----	-----

乌江流域傩戏面具及其文化蕴涵	余继平	324
土色土香的渝、湘、黔民间剪纸艺术	余继平	333
涪陵白鹤梁题刻“元符庚辰涪翁来”考辨	李金荣	341
乌江航运题刻拾零	周 晏	355
川黔关隘上的抗蒙题刻	周 晏	364
谪黔对黄庭坚书法艺术的影响	喻志全	375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研究

论土家族的牛崇拜	丁世忠	385
论土家族民间文化信仰的特征	丁世忠	394
先秦时期巴人信仰文化	杨晓红	405
渝东南墓冢的发展历程及特色	余 田	415
论重庆土家族地区传统物质生产民俗	何举春	422
石柱土家族黄连文化的内涵与保护	彭福荣	444

■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研究

重庆传说时代文学初探	马培汶	459
试论乌江流域民间歌谣的狂欢化倾向	易小燕	468
试论乌江流域竹枝词民俗内涵	彭福荣	475
石砭马氏土司文学述论	彭福荣	493
渝东南山歌民间美学思想初探	李 伟	508

后记		520
----	--	-----

前 言

.....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传承、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一章第二条明确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它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以及有关的文化空间等。

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党和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1997 年国务院发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2002 年文化部、财政部等单位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的精神，履行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再次加强了此项工作的力度。

乌江源于贵州省威宁县石缸洞，流经云南、贵州、湖北、重庆等省市，在重庆市涪陵城东汇入长江，全长 1 050 公里。乌江流

域是我国西南著名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居住着汉族、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回族、布依族、仡佬族、水族和白族等 40 多个民族,具有众多民族大杂居和单一民族小聚居的特点,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2006 年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计 518 项,石柱土家啰儿调、黔江南溪号子、贵州苗族芦笙舞等 15 项名列其中。研究乌江流域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能有效地保护和传承它们,而且能利用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资源来发展地方经济,推动社会进步和巩固民族团结。

乌江流域各地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2002 年贵州省颁发了《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2005 年重庆市下发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由于地理位置、研究条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必要而系统的收集与研究,各级民族宗教、文化、旅游等部门受经费、人力等制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和整理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有鉴于此,强化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研究,必然成为时不我待的紧迫任务。

长江师范学院地处长江与乌江交汇处,广大师生具有深厚的“乌江情结”,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自觉承担起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光荣使命。多年来,我校以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为主体的广大学者多次深入乌江流域,经过广泛考察和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人 2004 年成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将我校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推向了新阶段。《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我校学者长期致力于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部分研究成果,对推进此项工作或裨益。

开发与保护乌江流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只是起步;研

究学术和锤炼队伍,我们仍在努力。我们相信,有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有广大学者的刻苦研究、有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研究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戴 伟
2008 年 1 月

传统表演艺术研究

CHUANTONG BIAOYAN YISHU YANJIU



巴人乐器文化及其意蕴

曾 超^①

巴人是一个对中华民族有着极大贡献的民族,巴人的乐器文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巴人能歌善舞的民族特点,体现了至为丰富的巴文化内涵。

一、巴人乐器的发现

《华阳国志》卷1《巴志》云:“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又云:“阆中有渝水,賸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可见,巴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闻名遐迩,能歌善舞的民族。古代歌乐合体、乐舞并行,有歌舞必有音乐,有音乐就必有乐器。搞清楚巴人的乐器种类和丰富的乐器文化,不仅对于复原巴人的音乐文化,而且对中国古代音乐的研究亦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巴人的歌乐舞艺术在中国音乐、舞蹈的历史上影响极大,至今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巴人喜歌善乐,乐器种类较多。就现在所知,巴人使用的乐器,先秦文献并没有明确的记载。相反,巴人所使用的乐器多为后世出土或通过现代考古而发现的文化实物。最早记载发现的

^① 曾超(1966—),男,重庆黔江人,长江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地方文化研究。

巴乐文化实物是在魏晋六朝时期,对此,《南齐书》《南史》《周书》等多有记载。《南齐书·祥瑞志》记载:“齐建元元年(479年)十月,涪陵郡蜑民田建所住岩间……获古钟(应为钲)一枚,又有一器名鐃于,蜑人以为神物,奉祠之。”《周书·斛斯征传》称:“乐有鐃于者,近代绝无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征见之曰:此鐃于也。众弗信。征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之,其声极振,众皆叹服。征乃取以合乐焉。”《南史·始兴简王鉴传》谓:“广汉什邡人段祖,以鐃于献鉴,古礼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三尺四寸,圆如筩,铜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或作虎)。以绳悬马,令去地尺余,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兢荅当心跪注鐃于,以手振芒,是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古所以节乐也。”

巴人的乐器自宋以降在巴人生存的广大地域多有出土,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其家藏有三件鐃于,据《湖南通志》卷末之四引《容斋续笔》云:“淳熙十四年(1187年),澧州慈利县周赧王墓旁五里山摧,盖古冢也。其中藏器甚多。余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鐃,高一尺三寸……虎纽高一寸二分,阔一寸一分,并尾长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绍兴三年(1133年),予仲子签峡州判官,于长阳又得其一,甚大,高二尺……虎纽高三寸五分,足阔三寸四分,并尾长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鐃也。后复得一枚,与大者无小异,自峡来……”。随着现代考古的发展,巴人乐器更是出土极多。如湘西仅虎纽鐃于就发现有二十二件之多。

二、巴人乐器的种类

就目前所知,巴人乐器主要有钲、编钟、鐃于、甬钟等。

编钟:1972年10月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了3座巴人墓葬,不仅证实了《华阳国志》关于巴人先王陵寝所在地的记载,而且出土了众多精美的巴文化实物,如一号墓的错金编钟,二号墓的虎纽鐃于,三号墓的战国铭文铜戈、错银铜壶等。错金编钟为青

铜浇注,共十四枚。最大者口径 27.5 厘米,依次递减至最小者 14.6 厘米;最重者为 2 700 克,最轻者为 475 克(因锈蚀,递减不成比例)。编钟上有长方形鼻纽用于悬挂,两铤下垂;各枚编钟的午(顶部)、鼓(中部)、篆(下缘)部分分别饰以云雷纹、蟠虺纹、旋涡纹、绳索纹、三角形纹等纹饰,其中 8 枚编钟的钲、于、铤部有错金纹饰。被定为国家特级文物藏品。原件现存四川省博物馆,曾经被送到欧美、日本等国展出,受到很高的赞誉,现涪陵博物馆藏有一套复制品。1974 年湖北恩施龙王塘出土编钟 1 件,1981 年湖北恩施旗锋坝小村出土编钟 1 件;1989 年湖北恩施白果金龙坝一山洞出土编钟、洗、壶、簋等 8 件;1989 年湖北恩施屯堡马者出土编钟 1 件。湖北鹤峰姜家坡出土编钟 1 件(出土时间不明)。1990 年湖北来凤红岩堡出土编钟 1 件。1974 年湖北咸丰白水坝出土编钟 1 件,1978 年湖北咸丰阳洞水井马鞍山出土编钟 1 件,1979 年湖北咸丰收集编钟 1 件,1957 年湖北咸丰黄金洞出土编钟 2 件,1957 年湖北咸丰活龙坪缘化村断桥湾出土编钟 1 件。1979 年湖北利川谋道铜锣关四合村出土编钟 1 件,1983 年湖北利川铜锣关出土编钟 1 件。1975 年湖北建始猫坪出土编钟 1 件,1979 年湖北建始茅田阳坡白雅出土编钟 1 件,1982 年湖北建始茅田子母塘出土编钟 1 件,1986 年湖北建始长梁盛竹坝出土编钟 1 件,1989 年湖北建始长梁三块碑出土编钟 1 件。1981 年湖北巴东长江北岸火峰境内发现有编钟、洗、壶、钲等窖藏青铜器 21 件,1990 年湖北巴东大支坪连三坡一洞穴发现窖藏编钟 6 枚。1984 年湖北长阳榔坪马坪渠安头出土编钟 1 件。1978 年湖北五峰长乐坪洞口村出土编钟 1 件。1992 年重庆彭水黄家坝侯里乡出土绳纹编钟 1 件;1987、1988 年重庆彭水保家区各出土编钟 1 件。重庆酉阳共计出土编钟 3 件(出土地点不详)。1990 年重庆黔江濯西乡张家村出土编钟 1 件。1986 年湖南龙山红岩溪镇出土编钟 1 件,1978 年湖南龙山他沙乡出土编钟 1 件。1974 年湖北保靖西水

农场出土西周时期残编钟片重 5.25 公斤。

甬钟:它是巴人的又一种乐器,有时作为编钟的重要组件。1985 年在湖北秭归县周坪乡怀抱石村就发现甬钟 3 件,1973 年湖南吉首市大田湾出土甬钟 2 件,又在市区原振武营出土 1 件,时间不明。1974 年湖南花垣三角岩乡出土甬钟 1 件。

铜钲:它是巴人的又一种乐器。往往与虎纽铎于并用。1975 年湖北建始猫坪出土钲 1 件,1980 年在湖北恩施屯堡半云庵出土铜钲 1 件。1986 年在湖北建始县景阳高僚出土铜钲 1 件;1981 年 2 月在重庆黔江县舟白乡寨坡村出土铜钲 1 件,钲身饰蚕纹,身長 24 厘米,柄长 13.5 厘米,重 3.25 公斤,柄首饰蚕纹。1985 年又在黔江县中塘乡高石村出土 1 件,通高 38.5 厘米,身長 24.5 厘米,重 2.5 公斤,柄首饰变形鱼纹。1957 年在湖南泸溪县更出土铜钲 10 件。1988 年湖南花垣团结镇出土钲 1 件,1974 年湖南花垣三角岩乡出土钲 1 件。1976 年在湖南花垣澡子坪出土铜钲 2 件。

虎纽铎于:在众多的巴人乐器中,最能体现巴文化特色的就是虎纽铎于。铎于本是中原文化的产物,主要用于军事行动,在传入巴人地域后,为巴人所利用和改铸,因为它特别适应于巴人的尚武民族精神,故巴人在铎于的纽上铸上巴人的图腾虎,结果虎纽铎于就成为巴文化的典型器物。虎纽铎于在巴人生活地域出土极多,在湖南、湖北、四川、重庆、陕西、贵州等地均有发现和出土。对此,邓辉的《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①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充分的有关虎纽铎于的资料。

鼓:樊绰《蛮书》卷 10 引《夔府图经》云:“初丧,鼙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盘瓠、白虎之勇也。”又说:“巴氏祭其祖,击鼓为祭,白虎之后也。”《大明一统志·重庆府》引《晏

^① 邓辉:《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0—206 页。

公类要》也说：“伐鼓以祭祖，叫嘯以兴哀。”《隋书·地理志》则更称：“其左人则又不同，无衰服，不复魄。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箭扣弓为节。其歌词说平生乐事，以至终卒，大抵亦犹今之挽歌。”直到清代，作为巴人后裔的土家族仍然广泛实行闹丧、跳丧，土家族语言称为“跳撒尔嗬”或“撒忧尔嗬”。乾隆《辰州府志·风俗》卷14就云：“俗初丧……里党无论亲疏，皆来坐夜。鸣锣击鼓，歌呼逮旦，谓之闹丧。”同治《长阳县志》也说：“……诸客来观者群挤丧次，擂大鼓唱曲，或一曲众和，或问答古今，皆裨官演义语，谓之‘打丧鼓，唱丧歌’。”光绪《秀山县志》也称：“丧家奠馈，有哀歌辞，童子曼引唱。至于山野小户，则村氓牧竖击鼓为毗歌。”

三、巴人乐器文化

无论是从有关巴人乐舞艺术的记载来看，还是从巴人乐器文物的大量发现和出土来看，巴人乐器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对深入认识多彩的巴文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巴人的音乐体系

从发现和出土的巴人乐器实物，我们能够据以大体勾勒巴人的音乐体系。主要由雅乐和民歌构成。

巴人雅乐：这主要从涪陵小田溪出土的编钟反映出来。单独悬架使用的特大型钟称为特钟，有若干个成组依大小次序悬在一架使用的钟称为编钟。陈旸《乐书》记载：“古者编钟，大小异制，有倍十二律而为二十四者，大架所用也；有合十二律四清而为十六者，中架所用也；有倍七音而为十四者，小架所用也。”涪陵出土的巴人编钟据此当为小架所用。在古代，钟尤其是编钟是贵族统治者专有礼乐重器，是贵族宴享祭祀之时的必用之物，正如《王孙钟》铭文所言：“用显以孝，于我显祖文考。……用宴以喜，用嘉宾父兄，及我朋友。”古代编钟的大小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其功大者其乐备”，主要依据贵族的功劳、爵位、

等级、地位等而加以确定。因为,贵族统治者对编钟的使用“非以娱心自乐,快意自娱,将欲为治也”。自古以来,编钟的使用就属于雅乐体系。涪陵曾经是巴人迁徙进入重庆以后的第一个政治中心,许多大政方针在这里颁布实施,诸多盟会在这里举行,并且一直是巴人先王陵寝所在之地,众多祭祀活动在这里举行,所以,涪陵在巴人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1972年涪陵小田溪成组编钟的发现,依据《王孙钟》铭文对编钟用途的说明,我们发现这不仅反映了巴王的娱乐水平和层次,而且说明巴王“在追随中原奴隶制上已走得那么远,‘华夏化’得那么深,‘僭越’得那么厉害”^①,更重要的是这反映出巴人有自己的雅乐体系。“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涪陵——重庆的巴子国系由武王所封宗姬直接演变而来,因此,巴人的雅乐当是直接继承周人雅乐而来。

巴人不仅有自己的雅乐体系,而且巴人的音乐对中原王朝的雅乐产生了深远影响,丰富了中央王朝雅乐的内涵。汉高祖刘邦以巴人平定三秦,喜欢巴人歌舞,命令乐人演习操练,定名为巴渝舞,正式纳入汉王朝的雅乐体系,成为中原王朝演练武功,昭示武德,显示武威的“大武舞”,直到宋代长期流行于中原王朝的宫廷,这在《华阳国志》《汉书》《晋书》等籍中均有记载,学者们对此研究亦多。

巴人民歌:巴人的民歌对中国音乐文化同样影响深远。巴人的日常生活之歌在《华阳国志》卷1《巴志》中多有记载,主要反映巴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如:“川崖唯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唯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该诗是一首反映社会生产生活的诗歌,主要讲述了古代巴人勤劳勇敢,以农牧业为生,除打猎捕鱼之外,还在河谷陡坡播

^① 黄中模、管维良:《中国三峡文化史》[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种黍稷,以旨酒嘉谷侍奉父母,歌颂了巴人“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的传统美德。全诗因地叙事,活泼跌宕,不加雕饰,生活气息浓郁,情感真切感人。此类巴歌来源于民间,音声柔和,婉转悦耳,有极强的生命力,故传唱方便,影响极大。早在先秦时期,此类巴歌就广泛流行于巴地和楚郢(今湖北江陵)一带,即所谓的“下里巴人”。故宋玉对楚王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之者数千人。”巴人民歌以《巴人》为名,足见巴人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此类巴歌是巴人抒情状物,发泄情感,表达爱意的歌乐形式。胡震亨《唐音癸律》云:“竹枝,乐府之名,本出巴渝。”黄庭坚称:“竹枝歌,本出三巴,其流在湖湘耳。”《太平寰宇记》卷137记载开州风俗是:“巴之风俗……男女皆唱竹枝歌。”巴人民歌演变为中国民歌、音乐史上一种极为著名的体裁——竹枝歌与竹枝词,而今天的峡江山歌、川江号子、乌江号子、龙船调、土家丧歌等无不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 巴人武乐、武舞的发达

历史上的巴人以尚武名世,尚武精神极为浓郁,余在《巴人尚武精神研究》^①中有深入的分析 and 阐述。巴人尚武对巴人的音乐文化、乐器文化亦有深刻的影响,那就是巴人武乐、武舞的发达。

有关巴人军歌的记载,最早是巴人参加武王伐纣,“歌舞以凌殷人”,并名为《尅商操》,其歌词为:“上告皇天兮,可以行乎?”其后巴人帮助刘邦平定三秦,刘邦将其歌舞称为“武王伐纣之歌”,并将其纳入中原王朝的雅歌雅乐体系,成为中国古代乐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往往与中原王朝振武耀威,显示武威,弘扬武德,展示武容的军舞——大武舞一体使用。

汉代刘邦改造的巴人军歌主要有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安

① 曾超:《巴人尚武精神研究》[M],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弩,三曰安台,四曰行辞。这四篇军歌因系巴文写成,又是巴语演唱,“其辞既古,莫能晓句度”,三国王粲,询问巴渝帅李管种玉歌曲之意,并请其加以歌唱,据以改创新词。王粲改制的巴人军歌仍然是四篇,成为颂扬曹操武功的军歌,其歌词是:

魏《俞儿舞歌》四篇 王粲造

汉初建国家,匡九州,蛮荆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忘备武乐修。宴我宾师,敬用御天,永乐无忧。子孙受百福。常与松乔游,蒸庶德,莫不咸欢柔。右《矛俞新福歌》

材官选士,剑弩错陈,应桴蹈节,俯仰若伸。绥我武烈,笃我淳仁,自东至西,莫不来宾。右《弩俞新福歌》

我功既定,庶士咸绥,乐陈我广庭,式宴宾与师。昭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抚民黎,荷天宠,延寿尸,千载莫我违。右《安台新福歌曲》

神武用师士素厉,仁恩广覆,猛节横逝。自古立功,莫我弘大,桓桓征四国,爰及海裔,汉国保长庆,垂祚延万世。右《行辞新福歌曲》

西晋傅玄更制新辞,用以宣扬司马氏的武德。于是巴人军歌又被改制成为《宣武舞歌》,仍然是四篇,其歌词是:

唯圣皇简 矛俞第一

唯圣皇,德巍巍,光四海,礼乐犹形影,文武为表里,乃作巴俞,肆武士,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鹗,龙战而豹起,如乱不可乱,动作顺其理,离合有统纪。

唯兵篇 剑俞第二

剑为短兵,其势险危,疾踰飞电,回旋应规。武节其声,或合或离。电发星骛,若景若差,兵法攸象,军容是仪。

军镇篇 弩俞第三

弩为远兵,军之镇,其发有机,体难动,往必速,重而不迟,锐精分清。射远中微。弩俞之乐,台何奇!变多姿,迟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宣武象,赞天威。